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6-0015-07

#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

江 明 明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福建 龙岩 364012)

**摘 要:** 苏区时期,中共以起源于苏俄的苏维埃理论为指导,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外来的苏维埃理论和中国农村的实情未能充分契合,苏维埃的实际建立和运行,同中共在理论上的预设存在差距,从而出现了富农操纵工农政权、领导干部官僚作风严重、军队凌驾于政权之上、党政不分等众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党代政。中共当时并未认识到出现问题的深层历史原因,尽管后来又对苏维埃进行了改造,但弊端依然存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苏区;苏维埃;党政关系;以党代政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6.003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新型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中共虽被敌对势力蔑称为“土共”,但其政权的理念和形式却非常先进,是直接由苏俄引进的舶来物。苏维埃是俄语 *совет* 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 1905 年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后成为俄国新型政权的标志,从国家到地方,设立各级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立法权,并由苏维埃派生行政机构。中共将这一政权形式由俄国移植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苏维埃实际的建立和运作情况,却和中共预先的设想存在较大差距,从而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政关系的问题<sup>①</sup>。中共如何认识这一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如何对苏维埃进行改造,是本文研究的旨趣

所在。

## 一、理论上的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建立

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苏俄的经验,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就有了关于苏维埃的设想,较为具体的论述则见于 1927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会议文件《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关于怎样建立苏维埃,文件认为党应先建立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组建暴动参谋部作为将来的红军司令部,隶属于革命委员会,并由此组

收稿日期:2016-10-10

基金项目: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规划课题“权能演变:贫农团与苏维埃关系研究”(项目编号:LS2015022)。

作者简介:江明明(1992-),男,江西都昌人,2014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苏区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sup>①</sup>对于苏区政权的研究,以王旭宽《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4 年版)为代表。王著重点讨论了苏维埃政府的基本架构和制度,并对其正面特征有所阐述,而缺乏深入考察。而张玉龙、佟德元《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的党组织系统、党员结构与党政关系》(《苏区研究》2015 年第 1 期)则对苏维埃的党政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制度虽好,却因多方原因而存在以党代政的现象。卫团的行军路线和时间记载不详细。

织力量进行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由革命委员会来组织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配合行动,还应当进行关于苏维埃的组织和宣传。

如何组织苏维埃,理论上“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要充分体现民主;苏维埃政权要“吸收劳动群众,吸收贫人来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苏维埃的职能则分别设置各个部门执行,主要有军务部、财政部、市政部、社会保证部、国民经济部,几乎涵盖了现代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能。

针对苏维埃政府可能出现的各种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等,文件中号召广大劳动群众起来反对,发挥民众监督的作用。但怎样唤起群众,有何制度保障,则付之阙如。同时,为了让苏维埃代表真正代表工农群众,要求代表必须不时向选举人报告工作情况,如果代表的工作不合格,选举人有“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之权”。

军政关系方面,在决议案的设想中,是建立政权之后再组建红军。因此,“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苏维埃应坚决采取各种可能手段,以保障其兵士群众对于军官的作用,并因此可监督红军的一切动作”。

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苏维埃和党的关系,该决议案作了明确规定,认为“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并且要求苏维埃各机关的党团都要绝对执行党的指示,“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该由该地党委会批准”。不仅如此,从苏联的经验中,党中央当时还预见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提醒“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但苏联的革命经验中,是党的作用缩小,苏维埃有代替党的危险。因此中共中央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如何避免这种危险,“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注意党的组织之行为,毋使其发生软弱的现象。所以在党部工作的同志,不应当较在苏维埃中为弱,党经过苏维埃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志,应当在一切条件下,应该公开在苏维埃中,在苏维埃工作上增高和巩固党的影响”。

该决议案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在论述苏维埃的定义时,大段照搬列宁的原话,而对当时上海、广东的革命经验则持否定态度。由此可知,该决议案是当时照搬马列主义和

苏联经验的产物,虽然预见到了苏维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除了表示需要注意和防止外,提不出任何的得力措施,这就为以后苏维埃建设的实践埋下了伏笔。<sup>[1](P451-469)</sup>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成熟。“苏维埃政权是名副其实从枪杆子里出来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最常见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先有红军,红军打到哪里,由军队在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二是先由地方党组织暴动,再由暴动的武装建立政权。在现实生活中,前者显然要多于后者。”<sup>[2](P127)</sup>1929年1月,红四军南下赣南、闽西,先后建立永定、龙岩等地革命委员会,然后逐渐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以闽西为例,1929年11月,闽西先后正式建立了长汀、永定、龙岩和上杭四个县级苏维埃政府,50多个区苏维埃政府,597个乡苏维埃政府。而整个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也建立了至少2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sup>[3](P43-45)</sup>这就和中共以党委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为主体来进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一方面影响到下文将要论述的军政关系。另一方面,理论上苏维埃的建立应该是由下而上的,由一定数量的村苏维埃组成乡苏维埃,再由一定数量的乡苏维埃组成区苏维埃,然后是县苏维埃。<sup>[4](P22-23)</sup>但现实往往是红军打下某个县城后,建立苏维埃,再由上而下建立区、乡苏维埃。例如苏区第一个正式苏维埃政权就是长汀县苏维埃,由此再往下设立各级苏维埃。这样一来,地方苏维埃的建立就蒙上了委派色彩,是上级要求和帮助建立的,其工作也就更加依赖红军和上级党部。

在中共的设想中,相对其他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的优势何在?这是因为苏维埃“不是群众大会,更不是几个领袖包办的委员会,而是由各项职业工人和各乡农民群众之间,红军军营里,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由民意而选出,因民意而撤换,已没有群众大会嘈,不好讨论的毛病,又没有少数委员会包办的流弊,群众的意见可以马上提到政府里来,政府的行动也可以马上传到群众中去,这样才可以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同时也可以引进广大群众参加政治,以造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根本意义”<sup>[4](P16-17)</sup>。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大力推行苏维

埃政权建设,除了受苏俄的影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共设想中的苏维埃能真正代表群众,给群众以政治训练,且没有其他政治体制的弊端,既民主又集中,能快速而又真实地反映和解决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从上文我们已经知道,苏维埃在建立过程中就有很多地方和中共预先的设想不符。那么,实际运作中的苏维埃又真能达到预期效果吗?

## 二、苏维埃建立后的问题

毫无疑问,苏维埃在苏区的广泛建立和发展,对苏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对应付战争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际运行中的苏维埃,也和中共早期的设想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上,苏维埃由民众选举代表,成分上应由无产阶级即工人和农村中的雇农分子占多数。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是“富农流氓分子”积极参加革命委员会,后来又进入苏维埃政府,把持政权机关。正如1931年欧阳钦的报告中分析所言:“江西苏维埃政权是靠红军建立的,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分子,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一直到现在这一富农的基础还未肃清,所以这些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大部分仍是操在富农手里……”<sup>[5]</sup>(P377)不管这些富农流氓分子到底是什么成分<sup>①</sup>,但绝非中共所希望的“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的代表。直至1933年,省委的指示信中还提到苏维埃机关被阶级异己分子把持操纵,“富农任党的支书或乡苏主席,已经是屡见的事实(宜、乐、博、广均有)”<sup>[6]</sup>(P387-388)。由于大量的富农或流氓无产者等投机分子参加苏维埃,苏维埃对广大劳苦群众的代表性势必会大打折扣。

2.工作作风上,苏维埃政府也很难做到中共构想中的民主,反而出现很多问题。首先就是少数委员包办的情况。苏维埃本身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但在很多“已经建设苏维埃的地方,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议,仍然只是一个执行委员

会”<sup>[6]</sup>(P119),这就是说,在这些苏维埃政府里,是由少数执行委员包办一切的。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也提到个别地区“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就不开代表大会,由少数人包办”<sup>[7]</sup>(P48)。就算开了代表会议,“各处政权机关,只是挂着代表会议的招牌,实际上仍然是几个委员包办一切”<sup>[4]</sup>(P28)。其次是冗员问题。“各级政府开始时,冗员太多,有些区乡政府人员,多至六七十人,然都没有很好分配他们工作,致一般事务,堆积停滞,少数领袖身上应付不开,而多数人都又围在政府吃闲饭睡午觉。”<sup>[4]</sup>(P29)正是由于少数人专权和冗员太多,必然导致官僚作风和贪污腐化。据《红色中华》披露:兴国、万泰、赣县等县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啊!不仅如此,像兴国县主席与财政部长,鼎龙区财政科长,兴国所办的国家商店的经理等,吞没公款,假造账目,扯旧账造新账,等等贪污舞弊情形,更为严重。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将存款打埋藏,隐藏不报,差不多在兴国各区都是这样做。”<sup>[8]</sup>而“宁都戴坊区政府,发起伙食来就有十多人的伙食费,做起工作来,只有主席文书火夫,其余的通统走回家去了,甚至写几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有时有几人在政府,就摆起架子来了。苏区养了四匹马,上街(走几步路)吃酒也骑匹马,回家种禾的也骑匹马,下乡十里或十几里路,也骑匹马”。不仅如此,工作也是虚文敷衍,“各部的工作,在名目上差不多都有,刻下一个印子,但是在工作上完全没有一点”。<sup>[9]</sup>

3.军政关系。上文已经说到,由于苏维埃政权大多是依靠红军建立起来的,分田分地也是在军队的主持下完成的,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红军。因此政府和农民对军队的依赖性都非常大,工作重心也向为军队服务倾斜。江西苏区的各级苏维埃就被批评为“在党的包办之下,完全变为事务机关,变为专为招待红军、打路票、找伙子的事务所”<sup>[5]</sup>(P448)。苏维埃不仅要依赖红军,地方武装也是其重要的支持力量。县苏维埃有警卫营

<sup>①</sup>张鸣认为欧阳钦称为“富农流氓分子”的这批人,有可能是中共出于阶级观点给流氓无产者冠以“富农”头衔,也有可能是流氓无产者参加苏维埃政府后财产增加,被人们视为富农。见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第133页。

或独立团,区苏维埃有游击队,乡村则有赤卫队。地方武装不仅是保卫地方政府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红军的预备力量,因此受当地苏维埃和红军的三重甚至多重指挥,再加上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之间的力量并不均衡,这就很容易产生军政之间的矛盾,经常造成枪凌驾于苏维埃之上的现象。闽西就“有些地方赤卫队权力超过政府,有武人专政的倾向”<sup>[4](P29)</sup>。很多地方“不管边区和赤区腹地,都有不统一各自为政的地方武装乱打土豪以自肥,与政府对立,不听指挥”<sup>[5](P437)</sup>。

4. 党政关系。按照苏维埃的原意以及中共在苏维埃组织法和其他文件中的构想来看,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应该通过苏维埃政权中的党团起作用。但就现实而言,大部分人包括一般党员根本不知党团为何物,更不知如何具体运作来贯彻党的领导。因此,尽管早在苏维埃建立之前的中共六大,党就认识到了要预防以党代政和以政代党,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这两种现象都存在。在六大的决议案中,中共从苏联的经验出发,认为要加强党的领导,防止苏维埃过于强势。或许是矫枉过正,这样一来却使党在苏维埃建设中过于强势,以党代政和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在各地的各级苏维埃都相当普遍。在湘鄂西根据地,“党虽在苏维埃中成立有党团,可是党团好久不开一次会,如省苏过去三、四月不开党团会,甚至有不在苏维埃中成立党团的(如潜江县政府),党团好久不向党作工作报告,党也不检查党团工作,有什么事也不经过党团便直接命令苏维埃机关照办,同时苏维埃自己不建立独立工作,有事就找党解决,党也就替苏维埃包办下来,这种党包办命令与代替苏维埃工作的现象,确很普遍。苏维埃的委员大都是党员,非党群众很少,不抓得力干部到苏维埃做工作,不注意苏维埃工作的指导,也是普遍的现象”<sup>[10]</sup>。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中共的文件中多次出现<sup>①</sup>,则此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可见一斑。

这其中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批评党对苏维埃

的工作管得过多,一方面又说要抓得力的干部到苏维埃工作,这样的结果,岂不是造成党对苏维埃管得更多?这也让当时的下层党部和苏维埃无所适从。在遭到批评党包办政府工作后,两者的关系往往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党与苏维埃形成对立形势,党的负责人只办党,不过问苏维埃的事,苏维埃中党团有职无工作,完全是形式,聋子的耳朵好看没有作用的”<sup>[11](P232)</sup>。面对这种情况,党又会提出加强党在政权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党团须绝对服从同级党部的指示,经常向党做工作报告。坚决地反对苏维埃政权机关与党对立、不接受党的命令的现象,这些现象都将受到严厉的打击与党纪的制裁。<sup>[12](P70)</sup>由此,党政关系又回到原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委员,可以由党随便调来调去,苏维埃政权独立的组织系统被取消了<sup>[6](P352-353)</sup>,依然是党包办苏维埃,以党代政。

### 三、问题的原因分析

面对苏维埃建设中出现的困境,中共受阶级斗争影响,很自然地将这一切归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的遗毒,以及党对革命理论的忽视。<sup>[5](P635-639)</sup>然而正如张鸣所言:“这样两个剧烈对抗的政治集团,相互‘遗毒’是有难度的,但是各自身上都有苏俄的影响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sup>[2](P135-136)</sup>再不然,就归因于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和党内“立三政治路线取消群众组织的残余”<sup>[13](P626)</sup>。中共当时受限于历史,难以看到苏区以党代政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是很自然的事情<sup>②</sup>。我们得益于历史的后见之明,则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这其中既有当时的客观情势,也有中共主观上的不足。

首先应将当时中共在苏区的一切活动尤其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放在国共对立、苏区处于长期被“围剿”的战争环境中考察。苏区时期,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共战争,求生存,因此,一切活动都受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苏维埃区域一切组

① 仅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6册举两例。如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说“党不能包办苏维埃,不能命令苏维埃,不能在苏维埃中起党团的作用。绝不能使党直接向人民出布告,使党权超过政权”。在给鄂西党的指示中也明确表示“应该严重防止的而是以党来包办或代替政府”。见《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和《中共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6册,第323、406页。

② 有意思的是,抗战时期,邓小平对抗日民主政权缺乏民主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时,也认为“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织问题都必须适合国内革命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也概莫能外。所以苏维埃政权在战争环境下很难完全按当初的设想来建构,机构和组织也无法健全和完善。再者,苏维埃政权是依靠红军建立和维持的,红军是苏区的战争支柱,为了帮助红军赢得战争胜利,苏维埃的职能自然会向红军倾斜,沦为红军的“事务所”,当时甚至有“不赞助红军就是反革命”之语<sup>[13](P723)</sup>。战争环境下一切从权,以效率为先,而党包办苏维埃,确实能带来很大的便利,提高办事效率。因此,“由于许多事情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sup>[14](P73)</sup>限于战争环境和战争需要,苏区出现以党代政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苏区享有崇高权威,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这也为苏区的以党代政提供了客观基础。中共作为苏区合法存在的唯一执政党,根据地是在其领导下开辟的,红军也是党创建和指挥的,各种群众组织也是在党的指导下开展的,苏区的大事小情几乎都离不开党。再加上党注重对民众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因此,党在苏区民众中享有崇高的权威,被认为是万能的。很多时候,群众遇事要问党,苏维埃政府解决了,群众认为靠不住,一定要问党,问党必须问书记才放心。<sup>[5](P491)</sup>这种情形,无疑推动和助长了党包办一切的风气。

再次,与党在苏区的崇高权威相比,苏维埃的权威却非常弱。因为苏维埃是个外来概念,大部分农民乃至许多党员根本不知道苏维埃到底是怎么回事。广东的农民以为苏维埃是著名共产党人苏兆征的弟弟,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即我政府。<sup>[2](P136)</sup>民众对苏维埃的概念尚不熟悉,对其信赖程度更可想而知。并且,“各处政府尤其是县政府建立太迟,苏维埃应做的工作,如分田等,都被革委会做完了,因此减少了群众信仰苏维埃观念”<sup>[4](P29)</sup>。不仅如此,与党部相比,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的能力也差很多。党也承认:“轻视苏维埃的工作,把党内最无能力最不良的分子送到苏维埃机关中去,是最严重的错误”<sup>[15](P252-253)</sup>。这就造成党员不愿去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纵然被分配,都是受过处分的。即使是没受处分的党员,被分配到政府机关中工作,也“觉得受处分”。<sup>[5](P427-248)</sup>苏维埃成了党员的流放之地,很难想象这些党员会对苏

维埃的工作有多大的热情。结合这两个原因,苏维埃的权威与党的权威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就难怪民众只认党部,不认苏维埃,客观上形成了党的包办一切。

另外,民众的政权意识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千年的专制使得民众对政治缺乏热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苏维埃的内容,他们按照传统思维,“以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苏维埃,所以各级机关时常只有执委会议(甚至执委会也很少开,只有主席、财务、赤卫或秘书几个人处理一切)而没有代表会议。这是一般群众政权的意识太薄弱,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sup>[5](P49)</sup>。因此,即使有的地区苏维埃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民众依然按照过去的习惯,称政府为“局”,表明群众并不认为苏维埃和过去的政府有什么不一样。中共创设苏维埃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直接由群众自己做主,反映群众的要求,代表群众的利益,建立新型政权。民众的这种冷漠态度,无疑给苏维埃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巨大障碍。

然而以上的原因都是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克服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体制上的原因。苏区的党政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党政体制模式。这种体制虽然是一种双轨制,但如何使这种体制运行规范,效率高,党政两个系统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苏联自身也没有成功的经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唯一执政党,党的组织混同于国家组织,包办代替国家政权机关的一切工作,直接插手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苏联党政关系模式。它的弊端对苏联造成了深远影响,也对将其照搬过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造成危害。但当时的中共由于对苏联的盲目崇拜,并不了解这一点,反而归咎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遗毒。

#### 四、改造苏维埃

面对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认为是地主富农分子大量混入苏维埃进行破坏,再加上立三路线的残余以及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造成的。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契机,在苏区开展了广泛的苏维埃改造和选举活动。“各苏维埃区域应利用苏维埃代表大

会准备会的机会,实行自乡村下级苏维埃起的改选,坚强各级苏维埃或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党团,在当地党部的指导下去领导群众,在斗争中来肃清富农代表或委员会,经过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引进雇农贫农以至中农分子的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中。”<sup>[16](P399)</sup>由此可见,改造苏维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重新选举的方式改选苏维埃的成员;二是通过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将苏维埃中的敌对和腐化分子洗刷出去,同时引进积极分子。这两方面都已经有了专文研究<sup>[17-18]</sup>,兹不赘述。

军政关系方面,中共也做了调整,明确要求红军必须注意维护苏维埃的权威。早在1930年3月中共中央就告诫红三军前委:“要坚决的帮助群众建立并扩大苏维埃政权,而且用全力帮助这一政权树立指挥群众、管理群众尤其是肃清敌人的威权,红军更应该受这一政权最高机关指挥,使红军成为这一政权下的工农军事组织。”<sup>[16](P86)</sup>此时更是严厉批评红军党部“没有充分的注意到创造在劳动群众中有威信及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机关与红军的指挥机关常常没有好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红军中的党部和他的指导机关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他并没有把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当作自己的直接的任务之一”。因此,“红军中的党部是苏区党部中最健强的队伍,绝对不能够放弃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任务”<sup>[16](P728-729)</sup>,希望通过红军的党部来加强对苏维埃的改造。

从六大开始,中共就高度重视党团在构建良好的党政关系中的作用。但对如何发挥党团作用,一直是语焉不详。此后也开始明确要求党部必须通过党团来对苏维埃进行思想上的领导,并对党团的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建立党团的经常工作: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党团,来保障党的领导。党团应绝对服从所属党部的指示,执行其一切决议。经常保持党团在会议上一致的意见。加紧对于在机关内非党员的政治工作,达到取得多数来实现党的一切领导。党团在每一次政府和群众组织开会之前,必须召集会议准备自己的意见,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加紧对党团的领导工作的检查。”<sup>[16](P637)</sup>

上文已经提到,调党员干部去苏维埃工作往

往被视为是一种变相“流放”,经常调一些能力差的党员去。为了加强苏维埃中工作人员的能力,中共开始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强调“政府工作一定要派得力的同志去做”<sup>[16](P455)</sup>,政府部门“各级党团的领导者,应以党中最得力的同志充当”<sup>[16](P498)</sup>。另一方面则要求对苏区的干部进行一次总检阅,“考察他们的社会成分及经历、工作能力及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表现,合理化科学化的运用组织上的分工来重新分配工作。在检阅中要切实执行缩小上层机关,最高限度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那些浪漫、腐化、消极、敷衍、怠工、雇佣劳动化的表现,必须加以严格地审察和肃清。对于干部中的不正确倾向必须作不调和斗争,使现有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sup>[13](P535)</sup>不仅如此,中共还提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要在日常工作中锻炼干部,也要举办专门的训练班。尤其是要注意对工农干部的引进和教育,“以后在政权及群众组织指导机关当中,党应当注意引进非党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培养这些分子的能力,提高这些群众干部的积极性”<sup>[13](P637)</sup>。

通过以上的改造,应该说苏维埃中的种种问题有了很大的转变,民众对苏维埃的认识也有所加强。但是,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问题也长期存在。直至1932年6月,中共中央还在呼吁“建立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苏大会后,福建、江西两省苏大会的成功,给了两省苏维埃改造以总的领导,现在必须加紧进行下级苏维埃改造。要坚决的肃清政府中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分子,要严厉的打击政府中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消极、涣散、怠工与塞责的恶现象,对于政府中和平建设、不发动群众、不领导革命战争的错误必须立即予以纠正,要发展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选拔得力的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机关中工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分。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和决议必须求得全部实施,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建立各部与自己的日常工作,城乡苏维埃代表制必须坚决的实行,并要吸引苏维埃代表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各部委的实际生活,经常的召集分区分乡的选民大会做报告,以密切政权与群众的联系,以建立苏维埃在群众中的信仰。”<sup>[19](P306-307)</sup>由此可见,苏维埃建设中的问题一直存在,中共也一直在加以解

决。直到1933年的12月,江西省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还专门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江西省的苏维埃改造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其中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最为突出,但也明白指出苏维埃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必须继续改善。<sup>[4]</sup>(P277-284)

由于历史局限,中共没有认识到当时苏区出现以党代政的深层原因<sup>①</sup>,再加上苏区面临着严峻的客观情势,因此当时很难对症下药,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从中共的文件来看,只能是三令五申,告诫要避免党包办一切的现象。但怎样避

免,怎样才能既加强党的领导又发挥苏维埃的主体作用,却无法提出得力的措施。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中共当时要改造苏维埃的种种弊端,尤其是以党代政的问题,只能是加强党对其的领导和控制,这样反而更加重了苏维埃对党的依赖。这种以党代政的现象并没有随着苏区的失去、红军的长征而消失,相反,在抗日时期的民主政权中同样存在并且相当严重<sup>②</sup>。因此,深入研究苏区时期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看清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权以党代政现象的历史渊源,同时对当今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3] 王亿祥.从农民协会到苏维埃: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发展[D].赣州:赣南师范学院,2012.
- [4]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5]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6]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7] 《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 [8] 反对浪费严惩贪污[N].红色中华,1932-03-02(12).
- [9] 反对散漫与腐化的苏维埃政府[N].红色中华,1932-05-25(20).
- [10] 湖南省税务局,湖北省税务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7-1934[M].襄阳:南漳县印刷厂,1988.
- [11] 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厦门中心市委文件(1932年下)[M].福州:福建新华印刷厂,1984.
- [12] 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 杨会清.苏维埃选举运动的政治功能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3).
- [18] 江明明.苏区贫农团的权能演变及其与苏维埃关系考察[J].苏区研究,2016,(5).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下转第27页)

---

①直到1932年11月,中共在谈及苏维埃中官僚主义时,仍然认为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政府的原因是:“(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使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机关,日益生长起来”。见《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193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9册,第597页。

②董必武、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均批评过抗日民主政权中以党代政的错误倾向。参见曾志云:《我国党政领导体制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构建》,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4页。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袁贵仁.关于价值与文化问题[J].河北学刊,2005,(1).  
[4]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A].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Medita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d Resources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CHANG Sheng<sup>1</sup>, YAN Wan-rong<sup>2</sup>

(1.School of Marxism,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2.School of Fine Arts& Design,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336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inherent interrelations between red resources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d resources are super fountains which provide the core values with spirits, cultural base and educational material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an essential mark of socialism, are crystallization, demonstration and ultimate goal of the ideas contained in the red resources. To develop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on basis of red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note the relation between " source" and " essence" , as well a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outes and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Key words:** red resources; development; socialist core values

(责任编辑:韩 曦)

---

(上接第21页)

A Study of the Regime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JIANG Ming-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Institute for Central Soviet Area Studies,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viet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soviet regim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ssian soviet theory. However, due to the gaps between the foreign theory 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rural area,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soviet regimes showed differences with what the CPC had presupposed. There were such irregularities as rich peasants' manipulation, the bureaucracy of CPC cadres, predominance of army over regime, functional confus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regime, of which the last is most serious. Unfortunately, the CPC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deep historical reasons for such problems. Though it reformed the soviet regimes, there were still malpractices.

**Key words:** CPC; soviet area; soviet; Party-regime relationship; functional confusion

(责任编辑:韩 曦)